

自然写作:中国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

——《草原》主编阿霞访谈录 □李景平

李景平:从2021年开始,《草原》开设了“自然写作”栏目,倡导自然文学创作。作为一家边疆文学刊物,策划和组织开设这样的栏目,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和思考?

阿霞:《草原》虽然之前没有明确提出过“自然文学”这个概念,但在创刊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自然文学作品。而真正考虑发起“自然写作”并设置固定栏目,缘于去年《草原》创刊70周年座谈会上,傅非、鲍尔吉·原野、陈福民、艾平、兴安等几位作家、评论家建议《草原》率先举起“自然文学”这面大旗。因此我们在2021年第一期正式推出栏目,以刊物头条位置、每期50块版的体量,来展示我们推动自然写作的立场和态度。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草原》作为边疆的文学园地,作为多民族文化的文学载体,理应肩负起这个责任,以期引发文坛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与思考。

李景平:“自然写作”与自然文学、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关系如何?具有什么样的文学主张?

阿霞:由于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概念的混淆,很多作家对这两种创作形式的认知不是很清晰。“自然写作”的概念和定义,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自然写作是以自然为主体,由此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文学,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以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依然属于“他者”意义上的“参照物”。或许两者角度不同,但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主旨来说,是殊途同归的。

自然写作质疑和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人在自然中应该是与其它生物物种平等共生的,这种关系的平衡决定了自然的平衡。我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上的情感关系,比如蒙古族与马的关系,在蒙古人心中,马不仅仅是财富和工具,更是亲人、是兄弟,是家庭中的一员。这种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自然写作”的初心。

李景平:“自然写作”栏目在文学界的响应程度如何?刊物都推出了哪些作家作品?形成了怎

样的作家阵容和作品规模?

阿霞:《草原》倡导“自然写作”得到了十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积极响应,同时得到了《文艺报》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推荐。到目前为止,《草原》先后发表了40多位作家的作品,包括徐刚、张炜、陈应松、梁衡、鲍尔吉·原野、王松、艾平、皮皮、李青松、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任林举、庞余亮、周华诚、苏沧桑、傅非、王建中、刘惠春、东珠、王蕾、海勒根那、娜仁高娃、阿音等,有30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权威选刊及年选转载,《散文选刊》12期专门刊发了“《草原》生态散文特辑”。

“自然写作”也吸引了旅居海外的作家,比如棉棉,创作了《隐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纪小村》;获得过国际摄影大奖的蒙古族摄影师阿音,听说我们倡导“自然写作”,便将自己的第一篇自然文学作品《蒙古马》交给我们。这些例子表明,《草原》所倡导的“自然写作”得到了广泛回应和认可,“自然写作”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

李景平:《草原》在推出“自然写作”栏目的同时,多次举行“《草原》自然写作营”活动,“自然写作”成为了走进自然的文学,作家在行走中发生思想碰撞和文学交流。请谈谈写作营的现场“碰撞”和“交流”。

阿霞:《草原》自然写作营是我们号召作家们走出书斋、走进大自然,体验户外生存与生活的一项举措,或者说是一个实验。为此,我们分别在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举办了两次自然写作营。作家们在沙漠腹地安营扎寨,在荒野中行走,在帐篷中谈论创作,交流直面大自然的感受思考。大家认为,一部好的自然文学作品,应该是在深刻理解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哲学、社会、伦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创作思考和实践。

李景平:是的。草原是一种实指,也是一种象征。歌唱草原和抒写自然,讲述草原人的绿色故事,如你所说,在《草原》已经形成了传统,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草原》故事,会有什么不同于以往

的新意?

阿霞:丰富的地质地貌、多样的民族文化以及多种生产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内蒙古作家天然的、丰厚的创作资源。内蒙古作家对自然的书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与自然更是有着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严酷的生存条件、乐观向上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爱惜。作家们的生态思想,在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和文学创作中都有体现。

新时期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继承了民族文化中朴素的自然观与生存智慧,是当代较早进入自然文学、生态文学领域的一个群体。他们带着关爱草原森林、关爱生命的目光,用自己的心灵抒写着草原、大漠、森林、生灵动人的故事,不仅对当下失衡的生态现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在努力探寻救赎和重建之路。乌热尔图、阿云嘎、白雪林、阿尔泰、满都麦、莫·哈斯巴根、乌力吉·布林、阿尤尔扎那、海伦纳、冯苓植、肖亦农、邓九刚、艾平、路远以及新生代作家海勒根那、娜仁高娃、安宁、晶达、达拉、阿娜、刘惠春、谢春卉……他们的民族属性虽然不同,但都生长在内蒙古,文化基因里天然有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自然文学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学界多声部合唱中独特的嗓音。

李景平:《人民文学》《天涯》《广西文学》都曾开设过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栏目,与《草原》差不多时间,这是中国文学界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阿霞:如你所说,自然写作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界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觉,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调整和反思。我们过去认为大自然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被我们使用和挥霍。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异常,各种自然灾害增加,地

球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步枯竭,我们终于认识到,如果想要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我们就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它是与我们平等共生的生命体。

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催生了生态文学,但生态文学并不拒绝现代的生活方式,也不拒绝人类现代的发展,而是要找回在现代生活中遗失了的生活本真。无论生态文学还是自然写作,都是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来,是从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来,既是文化自觉,也是历史使命。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是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在自然和生态文化方面觉醒的明显标志。人类要想从根本上延缓或消除生态危机,首先必须洗净自身、清洁精神,只有全人类的生态意识与观念觉醒,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我们生存环境的健康,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延续。

我们当然要对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恶化发出警示和担忧,同时应该学会用心灵与自然对话,就像张炜在随笔《我行走,我感动》中所说的,通过“行走与实勘”“沉默与思悟”,与自然建立一种“相依相存和血脉贯通”的生命关系。

李景平:您对中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未来前景怎么看?

阿霞:相比于自然文学,生态文学更注重对“问题”的揭示,可以说“题材”的选择决定了生态文学创作的成败,这就很容易造成内容和题材的趋同化,比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动物保护、资源危机等等,这是生态作家关注最多的题材,作品相似度比较高,一些生态文学作品缺乏生态伦理和精神层次的思考,导致创作范式固化。

前面说过,我们既要生态危机表示担忧,更应该用心灵来与自然对话,与大自然建立一种血脉贯通的关系。有了这种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作家才能写出具有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自然文学或者说生态文学作品。很多作家已经自觉投入到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写作之中,并且追求独特的审美,我对中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



发展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李景平:《草原》作为内陆边疆的文学刊物,却具有开放性的面向中国面向世界的草原胸怀。作为主编,您对于未来的“自然写作”栏目有什么愿景?

阿霞:从整体上看,国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重视自然写作的作家和评论家还属少数。很多作家对生态环境方面的认知相对短缺,他们更愿意以社会关系和自身经验作为写作的出发点,认为生态文学和自然写作与自己无关紧要。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划分出生态文学或者自然写作,写出好作品才重要,但什么是好作品?拘泥于小时代而缺乏大历史的观照,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生活动琐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境界,在自然的大课题面前疏远和背离自然,会是好的作品吗?

如果考察古代经典文学和艺术作品,我们会发现,先秦儒道的“天人合一”,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宋元的山水绘画,无不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紧密关联。正是在人与自然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在人对自然的倾心与描摹中,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高峰才得以确立。当代文学中当然也不乏涉及或体现了生态观念和自然精神的作品,正是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的融入,使作家们有了新的创作视角,拓展了新的文学空间,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追求。这也为我们坚持和推动“自然写作”、展现自然文学创作的美好前景提供了一种指引。

文学的暗示来自童年

□刘惠春

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呼应与生俱来。

我出生在内蒙古西部一个叫苏海图的荒凉矿区,从院子里跨出去,就站在了一望无际的荒野上,荒野尽头是风沙笼罩的贺兰山。尚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却已经能够感受到无边无际的天空带来的疼痛,黄昏时沉下去的落日会让人惊慌,还有那些滋生了我所有想象力的云朵……自然就是以这样忧伤的方式进入了我最初的体验,进入了我的精神世界。

恰如华兹华斯所言,“不朽的暗示来自童年时期”。童年时期对自然的天然感应,就是一粒文学的种子,顽固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掌握着我的根源,连接着我的目光。抽枝生发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当时并不自知。

童年经验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对生命本质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纯粹具体的关于自然的感受,影响着一个人的视野、心灵和价值观念。在荒野,一切都是打开的,天空是打开的,沙漠是打开的,草木是打开的,孩子的心也是打开的,能装下许许多多的东西:沙漠上疾跑的沙蜥、喧哗的风、眼睛里云飘过的影子、手指迅速扎满的小刺……荒野给予我的,不仅仅代表了童年的所有乐趣,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了我与自然中众多事物的联系,包括那些日常看不到的来自内心的东西。这些事物培养了我对美的感受和表达能力,构成了我现在的样子。

草木自然,有着自身的内在意义,也有我们加诸其上的意义。自然能够独立存在,但人不能,人永远都活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孩子对自然的感知是最纯粹也是最本真的,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呼应。孩子长大了,这种感知也慢慢丢失了,自然就这样从人们的眼睛中消逝。太多新鲜事物取代了自然,这是自然的悲哀,也是人的悲哀。

对我来说,亲近自然是天然的,书写自然则是必然的。书写,让我重新回到童年的荒野、回到自然,以一种更纯粹、更真实的方式去观看、接触和思考,再现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生命感受。这些事物原本就在心里,我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内心路径,不断地重返、寻觅、接近、挖掘,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事物一一展开,重建童年时与自然在身体上的感应和联系。

梵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在自然界中,我处处发现感情和灵魂。”自然万物存在着纷繁独立的不同形态,如何去攫取、如何去表达、如何去呈现,亦是各自成章。最初的书写并不清晰,更多源自于童年时期留在心底的惊奇、感动和热爱,始于感官和心灵的第一视觉。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慢慢有了一个明确的向度,写作的语境在不断清晰和扩大,对自然写作的理解也在不断建立和重构。

我的表达方式,属于王国维先生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我所写的《草木五篇》《月光葡萄》《春天,在西鄂尔多斯》等文章,大多是从自身情感出发,带有我的个体经验和感受。书写既有记忆空间,也有现实场域,更多的是我与普通草木之间的生命关系和情感链接,包括自然给予我的慰藉和滋养。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对自然的呈现,很多时候也是对自我的呈现,当时的自我抑或现在的自我。我从未把自然和个人情感割裂开来,把自然放到一个孤立的情境中去。自然不是客体,也不是他者,更不是一个虚词,自然是鲜活的存在,是和我共生的、一体的、共同呼吸的生命。

我一直在不断地探究,自然,对于一个普通个体包括对于写作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整体的自然观,理解片面的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天地、宇宙是往复循环的,对自然的关注和体察,就是对无限存在的关注和体察。自然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文学审美,还应当有着更深刻的伦理和哲学意味,不断唤起人类渺小心灵的谦卑与虔诚。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依相靠、相系相牵的,人类只是万物中的物种之一,与自然中的一切共同经历生命的周始循环。自然悲悯博大、深邃宽广,它将巨大的生命力量传递给人类,让人类的存在完整,不会感到孤独。只有置身于纯粹的自然,用心去感知天地的永恒与宁静、宇宙的浩瀚与庄严,人类才能获得终极的关怀和慰藉。

自然是一个人的精神构成,也是我借以感受生命和世界的中介。一个人的感受在哪儿,写作就在哪儿。我的书写包括所呈现的方式,来自原生动力,来自童年时的种子,它只能是也必然是现在的样子。

童年荒野上的云朵,至今仍在我的头顶涌动。

千万种质朴源于自然

□娜仁高娃

在我的家乡,那个偏僻的沙窝地,牧羊人把傍晚夕阳下去后,星辰还没有完全缀满天空的一段时间称为“万物恐慌”的时刻。他们说,在那短短几十分钟之内,羔羊的叫声比平常更尖细、急促,各种夜鸟的鸣叫如同鬼魂号哭。他们还说,在这段时间,假如人在野地,就得喊几声,或者唱歌,将声音传递给那些感到惊恐的畜群,抑或是传给兔子、土獾子、石鸡等弱小的动物。同时,那里的人对天气的变换有着敏锐而准确的解读。比如,他们说,归鸟低飞,来年大旱;雀群扑突地抖翅膀,会有及时雨;小孩打喷嚏起风;马风(他们把从正南方向吹来的风称为马风)过后是雨;再比如,天际涌出塔云,必将有暴雨等等。

毫无疑问,在他们眼里,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都是自然界的赏赐,而不是通过征服自然界得来的。当然他们的生存也会面临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灾害,比如冬季的暴雪、春季的沙尘、夏季的干旱,以及狼群等野兽猛禽的袭击。即使如此,也很少从他们口中听到抱怨与诅咒。他们将“狼”称为“天狗”,这近乎是一种尊称。也有人会以“灰尾巴”“布海”“赖鼻子”等含鄙夷色彩的称呼来表达对狼的惊骇与厌恶,但是这里没有诅咒。在他们眼里,狼是生命链条中的一员,是不可被抹杀的。

他们的猎人不会在万物诞生小生命的季节里捕猎。天气寒冷后,着手准备冬储时,他们会宰羊宰牛,面对亲自照料成年后的家畜,他们会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在匕首上缠红布,找来毛毡铺在被宰的牲畜身下。他们会把“杀”说成“卧”。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花里胡哨的表演,而是一种对各自“命运”的认知。很多牧人家的畜群里,都会有一只不允许人类“沾手”的神畜,有的家畜即使没有被奉为神畜,但一直在畜群里活到很老,这种时候,牧人会自然而然觉得年老的牲畜有着令人赞叹的灵性。关于牧人口中的五畜也就是牛、马、山羊、绵羊、骆驼具备灵性的故事很多,比如有牛、马、骆驼会从千里之外独自回到故乡,有马匹会在贩卖牲畜的集市冲着陌生的牧人嘶鸣,有牛群会在与狼群搏斗时为了保护幼崽而围成一圈。

任何一个民族,在他们繁衍不息的历史长河中,都会创造出一代又一代人自觉或不自觉接受、记录、传承的民间故事。我在童年时代,经常从我的祖母口中听到《阿尔吉布布尔吉汗》《银铜金臂的牛犊》(阿拉姆斯)等民间传说故事。无论是歌谣、祭祀仪式、肩胛骨占卜,还是民间故事,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对大自然的赞美与敬畏。他们会从野性十足的跳鼠身上发现它们每天早晨与傍晚向着太阳叩首的秘密,从喇嘛鸟的啼叫中猜出它们正用美妙的歌声呼唤恋爱对象。

对于我来讲,故乡的一切就是我想要表达与发现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需要绕开很多“陷阱”。我所说的“陷阱”,指的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时时刻刻会遇到的、来自作者本人的无病呻吟与一意孤行。在那瞬间,我往往选择停下来。我担心陷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然后以撒骄的心态,在盲目不自信的驱使下,用华丽的辞藻堆砌空心阁楼。毫不隐晦地讲,我一不小心就会写出那样的句子。于是我会删掉,让一切回到先前的空白、洁净,但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常常回到故乡,或者到荒野戈壁去。当我面对古朴的自然界,我会感到最质朴的喜悦。我发现,走在宁静的湖边,走在空旷的戈壁、草原,人会自然而然地压低嗓门,甚至不言语。不是自然界需要我们,而是我们的心灵需要自然界的滋润。每一块儿石头,或者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河,都在提醒我们要安静下来。而心灵的宁静,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因此,我想做的就是用毫无矫饰的语调 and 质朴的文字来讲述这一切。

我常常想,我为什么如此沉迷于对自然的书写,仿佛只有在自然之中,我才能感知到生命的存在?

在巴丹吉林,我弯下身,以贴近大地心脏的谦卑姿势,听到一株白刺的呼吸,也发现了自我的存在。这存在渺小如一粒沙子,但恰是无数卑微的沙子落下来,形成了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这苍凉的沙漠向人类展示的,并非全是自然威严冷酷的法则,还有生命的伟大。千万年以来,冷硬的大风在浩荡的沙漠中,往返穿行于无数次,生命的足迹却从未在风沙中消失。就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我发现了锁阳、锦鸡、柠条、梭梭、芦苇、籽蒿、骆驼刺,它们强大的触角向天空和沙漠深处无限地延伸;还有蜥蜴、蛇、骆驼、蚂蚁、甲虫、飞蛾,它们也在金色的黄昏中自由奔走。而上百个静谧的湖泊和喷涌的甘泉,又让这一片人类畏惧的神秘之地充满勃勃生机。

就是在这里,我忽然间意识到,一个写作者应该对人类栖居的这片大地致以敬畏,给予尊重。作家全部的写作意义,不过是让读者认识到生命的意义,给予读者以人与自然万物应该平等对话的启示。

相比起一亿年前就已出现的蜜蜂、两亿年前就已存在的蝴蝶、从恐龙时代生存至今的灌木沙棘,距今只有三四百万年的人类是如此渺小。一只蚯蚓的一生,或许从不与人类发生关联,可是人类从未想过,有史以来对地球影响最深的物种,恰恰是两亿年前就已存在的小小的蚯蚓。它们一旦消亡,地球将呼吸急促,也必将给人类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便可引发一场海啸,而我们人类,不过是地球生物链上脆弱的一环。我们是自然的孩子,而非它的掌控者,没有无限地掠夺自然,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所有的写作者,唯有谦逊地弯下腰去,与一株看似柔弱的草木深情对视,从灵魂深处生发出爱与尊重,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爱情情仇,理解那些飞虫一样奔波劳碌的同类。他们短暂的一生,或许仅仅为了活着就历经艰辛、拼尽全力,我们只是千万种生物中最普通的一种。在这个星球上,每一个生命抵达或者离开这个世界,都会给予我们生死的启发:不管生命本身卑微还是强大,它在星空下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闪闪发光的奇迹。这奇迹本身,就值得我们书写记录、赞美歌颂。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星空宇宙关系的理解,最近两年,在完成“乡村四部曲”之后,我转向对人类栖居的自然的关注,并写下许多类似《万物相爱》的散文作品。我试图呈现出在不同环境地域下,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和生命状态。

“草木繁茂,雨水丰沛,桂花树在湿润的夜晚向疯生长。每一个角落都是生命,拥挤的生命,密密匝匝的生命,尖叫的生命。”

“一只岷江上的蜉蝣,此刻正在撩人的夜色下,完成它存活于世的唯一的使命——婚配。就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它们浪漫地在江面上飞翔,歌唱,絮语,产卵,而后生离死别,永不相见。”(节选自《万物相爱》)

是的,即便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它们的一生如此短暂,却与我们人类一样,有着完整的生命旅程。而在我们栖息的大地上,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让我们如此动容的生命,都有生命的奇迹与印记。即便是一把泥土,也因滋养了草木、昆虫、飞鸟、野兽而富有温度。我们脚踏着大地,却有潮流和浪,有回归母子宫般的柔情缱绻。

所以,我始终感谢定居十年的内蒙古大地。它在中国的北疆,有着丰富的地貌,草原、森林、农田、戈壁、沙漠、高山、湖泊,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区域,接壤八个省区和俄罗斯、蒙古两个国家,如此苍茫辽阔。我站在这片日日有大风扫荡的土地上,常常生出哀愁。这哀愁是对生命的爱与眷恋,是对我们应该如何度过一生才能不辜负生命的思考,也是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对如何书写我们诗意栖居的自然所生出的沉思。

我在这片北疆的大地上,写下对于一株金银木的热爱,写下赛马场上群马的悲欢,写下草木一样卑微的众生,写下大地上吟唱的歌者,写下黄昏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一轮崭新的太阳,如何从大地的身体中诞生,写下一个孩子对于这个世界好奇的窥视,写下永恒般的生与死,以及落在巴丹吉林的每一粒沙。

而当我真诚地写下它们、倾听它们、注视它们、追寻它们,犹如秋天的沙蓬草追逐大风,奔跑在荒凉的戈壁滩,并播撒下生生不息的种子,在这样的时刻,我真正理解了生命的伟大与人类英雄般的辉煌梦想。这荒芜又蓬勃的,神秘宇宙中蕴蓄的生命之力,还能有什么,比嗅到它温热滚烫的气息,更让我们动容?

世间万物让我动容

□安宁

“自然写作”大家谈